

---

# 记台北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两岸学术研讨会

韩信夫

---

由台湾中国近代史学会与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9月1日至3日在台北举行。出席研讨会的共178人，其中台湾学者147人，大陆学者31人。由台湾邀请大陆学者参加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这还是第一次，这也是1987年两岸开放以来，大陆学者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与会者提交论文59篇，其中台湾学者27篇，大陆学者32篇。论文题材多样，各具新意，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两岸学者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进展和新成果。兹简要概述如下：

## （一）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日记类抄〉》一文，利用大陆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记述了蒋氏这一时期的活动，并揭示其内心世界。作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到同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事变后，蒋介石迅速制订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日寇，注重外交，报道国民，还我东北’的方针。这成为他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但“他的思想认识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真正将国内外政策转轨到对日抗战上来，还是几年以后的事”。

熊宗仁《国民政府准备抗战之策略与何应钦——对‘亲日派’之我见》一文认为：将“攘外必先安内”视作国民政府准备抗战阶段“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之类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它主要是处理国内政策的国策，即内战的方针。史学界“历来对它

的反面的政策价值的评价较为重视,而对它的策略价值的研究则不够。对其错误的、反共的矛头指向批判揭露时,忽略了对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进行研究”。他说:何应钦是国民政府“攘外安内”的驯服工具,但不是“亲日派”,国民政府内并未出现“亲英美派”与“亲日派”的对立。

## (二)近卫文麿与侵华战争

陈鹏仁《近卫文麿与中日战争》一文认为,“近卫文麿是时代的悲剧政治家”。他说:“近卫应无帝国主义思想和侵略中国的本意。惟因日本统帅与国政的截然分离,使三任首相的近卫,对中日战争的处理和防止对美战争,都束手无策,致使日本走上国破家亡的道路。”李吉奎《第一次近卫声明之发表及其作用》一文,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在日本,近卫文麿被学者称为‘玩弄两面诡计的公卿政治家’。”“从1937年6月至1941年10月,近卫曾三度组阁,这段时间,刚好是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他是侵华战争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为了博取侵略成性的日本军阀的欢心与拥戴,他不但附和他们,而且推波助澜,多次叫嚣,非打得中国‘屈膝求和’不可,否则决不停止战争。”

## (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战场

关于正面战场的论文,有张同新《忻口战役评析》及胡春惠《对中日桂南会战的评价与反思》两篇。张文指出,忻口战役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在大本营的统一部署下,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配合作战。第二,第一、二两战区互相支援,共同阻挡日军南下。第三,开创了正面作战与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势,加强了打击敌人的力量,为长期坚持山西抗战,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创造了条件。作者强调,“这次战役出现了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全国军民奋勇杀敌”。“它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抗战提供了借鉴”。评论者对张文中忻口战役“与1938年进行的台儿庄战役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提法持异议,认为前者只具有局部意义,而后者则对八年抗战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胡文认

为，日军发动桂南战役是“草率行事”，是“日本发动对华侵略大的错误下，又一步小的错误”。日军在桂南“轻易开辟战场，最后又不得不轻易地放弃……如此一攻一撤，一进一退……犯了孙子兵法上无价值‘蹙军’的大错”。这“证明日本对此次之桂南战役之发动，实属多余”。作者还认为，中国进行桂南会战，“更是一次应避战而又不避战的粗糙之作，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再一次悖离了持久战大原则的小败笔”。

提交此次研讨会的有关国民党军抗日敌后游击战场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与兴趣。张玉法《抗战时期的鲁苏战区》一文，叙述了鲁苏游击战区从设立到撤销的全过程和该地区国民党军、共产党军、日伪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分析：“敌后战区与敌前战区的最大不同处有三：（1）敌前战区与大后方结为一体，支援、指挥都较为方便；敌后战区孤悬于敌后，后方的支持、指挥都不方便。（2）敌前战区战线分明，布防较易；敌后战区无明显战线，易攻难守。（3）敌前战区基本上为日军与国军的战争；敌后战区的战争，在国、共军属游击战……在日伪军属治安战，而日伪军未必互相信任，国、共军更常相兼并，甚为复杂。”作者写道，鲁苏战区“日军和伪军连年对国、共军扫荡，国军亦常发动牵制战，以配合正面战场……国军因不长于游击战最后不得不撤离战场，仅留下保安部队和游击队，继续进行两面作战，直到抗战胜利，日伪军目标消失，继续与共军作战”。

拙文《第一战区豫北游击区——兼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主要是依据口述历史资料写成。这是笔者在研究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的过程中，新近发现的又一块国民党游击区。文中写道：豫北游击区的特色是，“一个中原腹地的游击区，一个以民众游击队为主要抗日武装的游击区，一个一战区的重要兵站的游击区，一个重庆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重要基地的游击区。为人们打开了进一步认识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的新天地。它再一次证明：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除正面战场外，的确还有敌后的游击战场”。评论者对论文

表示赞同,并补充了若干重要史料。

#### (四)国共关系

蒋永敬《论中共抗日统战初期的“抗日反蒋”方针》、杨奎松《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其原因》与林能士《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与国共商谈——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探讨》三篇论文,分别叙述了抗战前夕与抗战后期的国共关系。与此相关的论文是李云汉《抗战时期的党政关系》(1937—1945)。李文旨在叙述抗战期间执政党中国国民党与政府之关系。此种关系之依据为国民党临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之《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案》。其要点为:1,中央采取以党统政形态;2,省(市)采取党政联系形态;3,县采取融党于政之形态。作者认识:“战时党政关系之运用甚有成效,若干战区省县能始终维持政权于不坠,尤属难得。”

蒋文说,中共从1935年8月“八一宣言”到1937年9月“共赴国难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曾先后提出三个口号:“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显示出策略运用的转变。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反蒋’、‘逼蒋’而至‘联蒋’,甚至‘拥蒋’,皆以‘抗日’为诉求。由结合‘反蒋’的力量,而至分化和争取‘拥蒋’的力量,突破蒋之‘安内攘外’政策,解除被‘剿’的困境,获得‘独立自主’的机会,从而继续壮大,夺取政权,推翻蒋的统治而有大陆政权。”

杨文披露了蒋介石于1935年12月下旬派邓文仪秘密赴莫斯科同中共驻苏代表团谈判国共关系,而后派陈立夫秘密赴柏林,准备就近指导国共谈判;从1936年1月13日至2月23日,邓文仪同中共代表潘汉年和王明商谈,双方商定国共两党谈判在国内进行,邓同中共代表潘汉年同返南京谈判;后蒋取消南京谈判,令邓改去柏林见李融清(陈立夫之化名),并与李同去莫斯科和中共代表谈判;1936年3月前后,蒋介石接通了同陕北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关系,决心自己解决中共问题,陈立夫秘密使命未有结果等情况。

林文指出:《王世杰日记》及相关资料显示,抗战后期,由于国

共关系日益恶化,蒋介石乃决定另辟途径,以政治协商寻求解决两党关系。政学系对中共问题一向主张政治解决而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却为CC派所反对。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决策的最后裁定者,但面对党内的异议,也难免有所踌躇。所以抗战后期国共商谈未有结果,国民党内因派系斗争而未能建立共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 (五)战时民众动员

陈三井《抗战初期上海对变局的肆应》和吕士朋《抗战期间的社会动员》两文,分别论述了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动员民众投入抗战洪流的动人情景及其所显示的伟大力量。陈文论述了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各党派团体、士、农、工、商、妇女及青年学生等各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指出上海对抗战初期的变局作了如下的贡献:1,在组织动员、群众动员方面,上海占据了带领全国风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2,在劳军捐款、认购国债方面,上海各阶层不分企业家或工人,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相当杰出的表现。3,在文化救亡方面,上海的各个团体最为活跃,所办的各种刊物和活动也最具声色。在全民团结,政党合作的前提下,中共地下党透过亲共团体或左翼文人,扮演着主导的角色。4,在工厂和大学内迁方面,上海也起了带头作用。

吕文指出:“在八年抗战期间,全民的社会动员包括国民精神总动员,青年踊跃参加青年团与响应从军,劳工增产报国与地下抗日,农民应征当兵与缴纳田赋,妇女慰劳将士、保育难童与投入生产,都是具体的爱国行动,充分显示了伟大民族精神,在社会每一个角落浓烈地弥漫。”

#### (六)国际关系

此次提出的国际关系论文,涉及中苏、中英、中美、中法、中德等10篇。邵铭煌《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一文,运用孔祥熙与蒋介石、贾存德等人来往函电、报告等新发现的文件,参照已公开的有关记录,指出孔祥熙在抗战初期议和态度积极而且行动

切实。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后来所以未走上与汪精卫一样的道路,主要是因为孔祥熙的忠诚信念,其谋和的出发点,以试探为先,不求躁进,故能避免误陷对手圈套。

马振犊《德国军火与中国抗日战争》一文认为,有关抗战爆发前后德国军火输华是中德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依据中德双方的资料,尤其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叙述了德国军火输华的情况,并对德国供华军火对中国抗战之价值进行了评析。

陈谦平《宋子文访英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一文,利用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搜集的资料,对1943年7月至8月宋子文访英的经过及其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关系所起的作用,做了较详尽的论述,认为宋访英对发动缅甸战役仍有积极意义,促进了中英信用贷款的谈判,为后来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同邱吉尔的会谈,以及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打下了基础。

#### (七) 沦陷区

有关沦陷区的论文共9篇。董长芝《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工矿业之掠夺及其后果》,解学诗《东北沦陷区鼠疫流行与日军细菌谋略》,霍燎原《日本在中国东北沦陷区实行的民族统治政策》,周启乾《九一八后日本‘开发’华北经济及其实质》,黄美真《华中振兴公司:抗日时期日本控制华中沦陷区产业的垄断机构》,陈铁健《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华中华南的金融统制》,陈胜彝《论日军侵粤对广东经济之影响》,章开沅《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等论文,从多方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占领区域的经济掠夺,及对平民百姓实行残酷统治与野蛮屠杀的罪行。其中章文以南京沦陷后,奉命留守校产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生前保存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档案文献为依据,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纯系虚构”的谎言。

#### (八) 西南大后方

吕实强《试论抗战期间的四川精神》一文指出:“八年抗战所以

终于获得胜利,原因很多,其中一般所谓的‘重庆精神’,自为其中重要的一项。”作者将“重庆精神”概括为“坚忍不拔”和“竭诚报国”。“所谓坚忍不拔,往往以重庆遭受日本持续的和大规模的轰炸,军民始终坚毅不屈,淬厉奋发为证;所谓竭诚报国,则以川军出川开赴前线作战,大量壮丁补充各部队,粮食充分供应,财力踊跃捐献,以及巨大的所谓特种工程的建构为代表”。作意见认为,此项精神并非重庆所独有,在四川“发挥得最充分,表现得最光辉”,所以作者将“重庆精神”改为“四川精神”,以为“抗战期间的四川精神,亦实在是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评论者提出,“四川精神”的内容还应当加上“精诚团结”和“共赴国难”;另一种意见认为“重庆精神”不必改为“四川精神”,如同“延安精神”之不改“陕北精神”。

何一民《抗战时期西南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一文,将西南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从1938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是西南经济跳跃式大发展的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为西南经济畸形发展阶段。作者指出,西南经济的发展,“不仅对支持抗战取得胜利、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另外,战时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西进也促进了西南一批城市的发展……从而为西南地区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冯祖贻《抗战期间内迁人口对西南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提出西迁人口在300万左右,其中四川200万,云贵100万。“内迁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线,从事的职业以商业为多,依次为家庭服务、工矿、交通、公务。内迁人口素质明显高于本籍,性别比例上男性超过女性”。

### (九)战时的台湾

关于抗战期间的台湾,有刘凤翰《抗战期间台湾日军活动》、楼子芳《论抗战时期的台湾义勇总队》及郑梓《〈光复元年〉台湾军事图像之一——战后台湾的军事受降、遣返与复员》3篇论文。其中

楼文记述了李友邦组织在大陆浙、闽一带的台湾同胞，创建了台湾义勇总队，及其动员台胞参加祖国抗战，实现“争取独立，归返祖国”目标的活动情形，并指出：“台湾义勇总队积极参加祖国抗战，再次说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始终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郑文采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新闻及图片资料，并辅以文字的叙述，呈现了台湾“光复元年”（1945）受降的历史图景。

#### （十）抗战的损失与索赔

迟景德《从抗战损失调查到日本战败赔偿》一文详述了我国历次调查抗战损失之经过情形，及抗战胜利后，行政院设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后改为“行政院赔偿委员会”）进行全面调查，并于1947年5月20日发表抗战各项损失统计数字，但当时未包括“东北、台湾及中共占据区的各项损失”。“在依据波茨坦宣言日本以实物赔偿的原则下，我国要求日本赔偿是非常积极的，虽然后来仅获赔偿部分军工设备，共约仅值美金22070282元，实不能与抗战的惨重损失相比较，但日本确曾有过部分赔偿给予我国”。吴天威《中国对日索赔之过去与财产损失问题之商榷》一文指出，目前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求日本恢复“先期拆迁”（1949年5月13日美国政府向东京盟军总部发出指令取消“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这可谓合法合理之要求。较恢复赔偿更为实际的，是日本归还自我国掠夺的物资，特别是文物。

以上所述，只是部分论文要点，还有省区抗战、战时教育、战时文化、汪伪政权、受降等方面的论文，因为篇幅关系，此处不能一一介绍。

三天的研讨会，两岸学者济济一堂，对口讲评，交流学术思想，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与会学者呼吁两岸学者共同编写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有的学者还建议先写国共合作史，促进两岸统一，历史学家责无旁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